



# 一位人類學者的信念和關懷

## 讀李亦園先生著《鶴雀樓上窮千里》

吳遠鵬 ◎ 福建泉州市方志辦公室編輯



鶴雀樓上窮千里：  
李亦園散文與演講選集  
李亦園著/立緒文化/9608/413頁  
21公分/380元/平裝  
ISBN 9789867416735/078

先前因事到李少園先生家中請教，交談中恰逢郵差送來由臺灣寄來的其兄李亦園院士的著作《鶴雀樓上窮千里：李亦園散文與演講選集》，少園先生抽出一冊來借我，讓我先睹為快。回想去年11月，他也曾將剛剛收到的李亦園先生的《口述歷史：李亦園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5年）借我先覽，少園先生予我的隆情厚誼，真讓我五內銘感。

甫到家中，我就決定先放下手頭的所有事情，迫不及待地看起李亦園先生的這部新著，這是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8月出版的，果真還「帶著墨香」。本書係由亦園先生的公子、同時也是其學生和同行李子寧先生所編，亦園先生的二女李康齡則為本書設計了一個很有意境的封面，李子寧先

生還為本書撰寫了一篇飽含深情、真摯感人的序言，為我們解讀這本著作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脈絡。

該書分為5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田野圖像之外——考察記遊」收錄了李亦園先生的考察、遊記散文8篇，足跡遍及山西永濟市鶴雀樓、山西夏縣的西陰村、廣西博物館的「銅鼓之旅」、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捷克布拉格和庫納荷拉小鎮、山西祁縣的喬家大院、美國的博物館之旅，以及美國阿利桑那州的「亞柯桑底」城。第二個單元「典範猶存——憶往懷舊」則寫了懷念臺海兩岸如李濟教授、費孝通先生、李慎之先生、林衡道先生、弘一法師、胡適先生等師友朋輩的文章6篇。第三個單元「田野與書齋之間——師友著作序言」收錄序言11篇，皆短小精悍，具畫龍點睛之效。接下來的第四單元「人類學的人文關懷——演講與對話」則收錄了李亦園先生在臺海兩岸高等學府或學術研討會上的7篇演講稿，和在北京與費孝通先生就人類學前景的對話、在臺北與聖嚴法師、楊國樞教授就新興宗教的三人

鼎談；最後一個單元是「另一種鄉愁——其他論述」，其中的〈泉州學的新視野〉一文是亦園先生作為長期漂泊在外的遊子對於家鄉泉州有著無限眷念，而以他的專長——學術饋報故鄉的傾心之作，在嚴謹的學術論述中充盈的是濃濃鄉情。

李子寧先生稱尊大人的考察記遊散文為「李氏遊記」，是因為這幾篇文章與一般人所寫的遊記散文不大一樣，它們往往都是在旅途觀景過程中，某一個情景或細節觸動了作者的心弦，由此生發開來，既融入了文化現象的觀察，又寄託了作者的所感所思，是人類學家的「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對話」，不但見微知著，並且給讀者以深刻的啓迪。像〈喬家大院的大紅燈籠〉一文就是亦園先生從參觀作為著名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場景地的山西祁縣喬家大院，引發出對電影就喬家大院作場景，突出了大紅燈籠，以此來烘托影片中主人公妻妾成群的家族氛圍，與真正喬家大院勤、儉、誠、義的嚴格家風和治理商號的理念大相逕庭，「對喬家來說，總是頗有不公之處。」亦園先生這篇文章還分析了喬家主人的創業歷程，所奉行的企業理念，指出這是一個體現山西人自創的理財文化的典型，認為應該深加發掘山西的「理財文化」，甚至「管理經營文化」。該文還引發了大陸費孝通先生的學術興趣，撰寫了〈晉商的理財文化〉一文與之相應和。

在〈館行管見〉一文中，亦園先生記述了他的一次全美博物館之旅，在四十天當中，參觀了美國二十幾個各種類型的博

物館，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華盛頓國立歷史與技術博物館主持的一項有關人類衣服進化的特展，通過對展覽使用的「少數人之衣」（clothing for somebody）、「任何人之衣」（clothing for anybody）、「人人之衣」（clothing for everybody）和「人人之物」（something for everybody）四個「俏皮」的標題所反映的人類衣飾進化的四個階段，亦園先生感悟到這甚至可以說明人類社會演進的方向，他說：「衣服製造與穿著的現代化只是代表人類社會現代化的一面，而人類社會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也和上述的過程完全一樣：在傳統的社會裡，只有少數人參與公共事務，不論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都握在少數人之手，只有等到民權思想覺醒的時代，大多數人普遍的參與才成為其特徵，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活動都有大多數人的普遍參與，而不受少數人控制，正如衣服之普及於每一個人，而不是少數人所特有一樣。」亦園先生還進一步指出：「普遍的參與並不是現代化社會的唯一特徵。很多人誤會，以為只要有多數人普遍參加到社會的、政治的活動中，這就是現代化了。這種想法實在是對現代化過程有相當大的誤解，現代化的社會不僅是要大多數人普遍參與，同時也是要让普遍參與的人有自由意志的選擇，這種自由的選擇是現代化社會與未來社會最重要的指標。」

李亦園先生是人類學大師，從事人類學研究已超過半個世紀，對於從事這項工作的甘苦，可謂冷暖自知。書中有一篇〈寂寞



的人類學生涯——喬健著《漂泊中的永恆》序），對於同為從事人類學考察與研究的學弟和老友，他寫出從事人類學研究幾十年的肺腑之言。他說，「人類學是一門冷門學科」，「學人類學的人不但在學校裡十分孤單寂寞，畢業後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人類學家的寂寞和辛勤勞作也往往不為人理解，還經常被人誤解，「人類學家就是這樣不自討好的人，寧願形單影隻地到蠻荒之地過寂寞生活，做研究時土著對你不耐煩，威脅要驅逐你，做完研究寫成報告後行政主管們又討厭你咒詛你，難道人類學家真的是這樣不為人喜歡的寂寞生涯嗎？」亦園先生這樣追問著，隨後他自己給出了答案：「其實人類學家並非真的是喜歡寂寞生涯，人類學家之所以樂於奔走於蠻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與行政人員的譏諷，原也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就如喬健兄在書中〈漂泊中的永恆〉一篇所描述瑤族人追尋他們的千家峒一樣，人類學家只是在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恆本質的信念。」

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永恆的信念，亦園先生在人類學領域裡不懈地探索，從「可觀察的文化」到「不可觀察的文化」，從「他者的文化」到「我群的文化」，從「微觀的文化」到「宏觀的文化」，完成了一個人類學家「由具體至抽象、由遠而近、從微見巨」的理想歷程，「使他的著作得以遊刃有餘的進出於不同層次的文化現象裡，出入於不同文化的異同間，從而由細節微觀裡演繹宏觀的理論架構」（見李子寧：〈編

序〉）。亦園先生所取得傑出成就就在本書第四篇「人類學的人文關懷——演講與對話」中所收錄的〈從考古學人類學論傳統身心關係〉（氣與文化研究）、〈生態環境、文化理念與人類永續發展〉（中國文化的內在結構與環境和諧關係研究）、〈新世紀的人文關懷〉（全球化議題研究）、〈環境、族群與文化〉（臺灣少數民族研究）、〈海外華人研究的若干理論範式〉（海外華僑華人研究）、〈進出於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和〈「美人之美」與「各美其美」〉（人類學本質與前景研究）等各篇演講與對談中得到很好的闡發與論述。這部分內容是非常值得我這個學術的「門外漢」一讀再讀、慢慢體會的。

人類學是一門「洋學問」，李亦園先生也曾經留學於美國的哈佛大學，並在國外（馬來西亞、婆羅洲、菲律賓）從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但我在閱讀他的這本《鶴雀樓上窮千里》時，卻看不到他有什麼「洋派」，相反，我深切地感覺到他是一位傳統的中國式的知識份子、一位中國「士大夫」的傳人。

在書中，李亦園先生多次飽含深情地回憶起他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高去尋、石璋如、凌純聲、芮逸夫等學界前輩的師生情誼。1948年，亦園先生考取了臺灣大學，後來上述這些大師因時事變遷而匯聚於臺灣，成為亦園先生的老師，有的還成為他畢業之後供職的中研院的同事，「機緣再加上環境，使得他與這些師長間建立起一種既

師、亦友、又如父執般的親密關係」。2004年，亦園先生和喬健先生到大陸的山西省考察訪問，除了各處著名的古跡遺址，亦園先生心中最主要的目標卻是一個一般旅遊者都不去的地方：西陰村遺址。原來西陰村遺址是他們的授業老師、著名的前輩考古學家李濟博士在1926年親手發掘的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當他們歷盡周折、一路探問來到遺址前，看到「西陰村遺址」的紀念碑時，他們二位「走近前去，摸著石碑，心裡都十分激動，有如看到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這時離他們老師李濟教授去世也已經二十五周年了。從亦園先生的筆觸裡，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他終生感念師恩的心境。

李亦園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兩位著名人類學家的相識相知是海峽兩岸學界交流的一段佳話。自1980年兩人在美國匹茲堡相識訂交之後，費孝通先生不僅幫助亦園先生和大陸泉州的家人恢復聯繫，幫助他與數十年未見的老母親和其他家人相見，兩人因為同為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同行之故，在二十多年時間內有二十多次聚首共同切磋學術，結下了極其深厚的友誼。2005年4月，費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亦園先生因身體健康欠佳，「未能親赴致哀，極感遺憾歉疚」，翌年，在北京召開了費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研討會，亦園先生雖又因體弱未能出席，但為追思會寫了一篇飽含深情的論文：〈從「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與志業〉，全面回顧了費先生的學術歷程，並對他的學術思想和實踐給予

了高度的推崇和評價。在本書所收錄的另一篇文章〈李亦園自選集·自序〉中，亦園先生更稱「費先生可以說是我的私淑老師」，兩人「終至成為忘年之交，他對我這個後輩的鼓勵與指導，實在不下於我早年的老師李濟與凌純聲先生」。

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都有一種以自己所學「興邦濟世」的崇高志願和情懷。身為一位人類學家，李亦園先生有著視野更為寬廣、眼光更為獨到的獨特之處，他的「興邦濟世」的胸懷也因此顯得更為寬廣與博大。亦園先生晚年最令人矚目的學術貢獻是提出並逐步完善的一個全新的理論架構——「致中和：三層面和諧均衡的宇宙觀」，這是一個基於人類學的重要研究傳統：比較文化研究的基礎之上，通過多年來對漢人民間宗教、儀式行為與中國人「氣文化」研究等實證研究，而提出的描述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內在理念的宏觀理論模式。通過這一理論架構的建立和探討，特別是與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亦園先生反復強調：中國「致中和」的理念不只反映在各層次的社會文化現象上，同時也可作為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另一種選擇。

在作於2000年〈新世紀的人文關懷〉一文中，李亦園先生回顧過去的20世紀，「雖說是一個人類知識科技突飛猛進的世紀」，「也是一個戰爭頻仍、族群相互敵視、社會政治動盪不安、生態環境飽受破壞的世紀」，人們憂心在新的世紀來臨之時，戰爭、仇視、衝突與危機是否會變本加厲而使



人類蒙受更多的不安、焦慮與痛苦，為寄望全體人類能藉以有所反省體會，能夠努力扭轉危機的走向，促使逐步走向康莊之道，李亦園先生以為賦予人文的基本關懷是最重要的策略，其中四種最重要的人文關懷：他人的關懷、民主的關懷、文化的關懷和全人類的關懷，是應該特別予以重視的。亦園先生說：「我們迫切地希望全人類的不同族群都能重視這些極具關鍵性的人文關懷，但是我們更殷切地期盼這些人文關懷能從我們自己的社會切實做起，不但能從我們自己的社會做起，並且能從自己文化的寶庫裡發掘可為新世紀全人類所用的人文思維，藉以促進世

界社會的共榮共用，就如耶魯大學漢學家史景遷博士（Jonathan Spence）最近在《新聞週刊》（*Newsweek*）所寫的，寄望於黃帝子孫能在他們的祖先於第十二世紀創造人類文化高峰的九百年後，再軋始另一次文化的高峰，並為人類的前途開拓全新的境界。」李亦園先生的高瞻遠矚和胸懷全人類的情懷，他對自身母體文化的自信和文化自覺，在這篇講演中表露無遺。「知父莫若子」，就像李子寧先生的〈編序〉中所說的：李亦園先生「是這樣一個綜合著科學人簡潔明暢風格與傳統文人經世胸懷的學者」。

